

## 禮尚往來中的「敵對互仿」： 吉哈爾論禮物

林德祐\*

### 摘 要

法國文學批評家、人類學家吉哈爾 (René Girard) 以「仿效慾望」(désir mimétique) 的觀點探討人際關係隱藏的敵對性。對他而言，敵對性並非來自差異的兩道個體，而是來自慾望的雷同與複製，因為慾望的仿效導致相異性消弭，造成主客體界線的鬆動，危及「主體間性」(intersubjectivité)，進而導致雙胞式的敵對衝突。本文試圖探討吉哈爾對人際互動的詮釋，進一步以此理論詮釋禮物這種禮儀文化下的餽贈與回禮行為暗含的「敵對互仿」(rivalité mimétique)，探討禮尚往來背後弔詭的相互性。首先，我們鋪展吉氏的「三角慾望」理論，即慾望「從他性」，以及仿效行為作祟下的敵對情結。其次，我們辨析慾望機制中「雙重中介」(double médiation) 的形成，雙重中介的情境使原本涇渭分明的主體與客體不再有區別，將兩者變為如影隨形、相互較勁的「偽」主體（或「準」主體），暴力遂扶搖直上，不可扼抑。吉哈爾對禮物的詮釋便是立基上述兩點。從吉氏的觀點來看，禮物的矛盾在於：它必須同時具備「差異性」與「同質性」。差異性的需求源自「主體間性」對相異性消解的恐慌；同質性則又來自共同體中個體相互仿效的需求。禮物儀式之中潛存著這兩個相互矛盾的規則，既是一種人際關係的拉近，也是一種「相互性」的解套。整體觀之，支配禮物的規則縝密細膩，這些規則試圖符合相互性與對等性（平等性）的原則，同時又必須與「差異性」的需求調和。透過吉氏對禮物文化的析論，我們可以從文明起源的角度了解儀式機制的運作與消解，也可理解禮物在現代社會中的有效性與弔詭的特性。

**關鍵詞：**擬仿慾望、雙重中介、主體間性、禮物儀式、敵對雙胞

---

\* 本文 2012 年 3 月 10 日收件；2012 年 5 月 14 日審查通過。

林德祐，國立中央大學法國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 **Rene Girard's thoughts about the mimetic rivalry in the rite of gift exchange**

Te-yu Lin\*

###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imetic desire, the French critic and humanist Rene Girard discussed the implicit rivalry that exists i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Girard considered such rivalry to be generated rather by the similarity and reproduction of human desire than from the differences of two individuals. The effect of mimetic desire results in appropriation and the disappearance of differences, and the disorder of the desire operation, in the subject-object form, loosens the line between “to be” a subject and “to possess” an object; thus, inter-subjectivity becomes endangered and the conflicts between twin rivals become engendered. Based on Girard's interpretation of human relationships, this paper discusses and reinterprets this paradox under the rite of gift exchange, as well as examines the mechanism of mimetic rivalry behind mutual exchanges. Firstly, this paper explores Girard's theory of triangular desire and the role of the follower in mimetic behavior, as well as the rivalry complex. Secondl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ormation of double mediation in the desire mechanism. In the context of double mediatio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object and the subject vanish, and they become the same form, imitating each other. Through this transformation they both become false subjects, causing the violence between them to increase irreversibly. The above mentioned constitutes Girard's interpretation of the culture of the present. From Girard's point of view, the paradox in the rite of gift exchange is about the coexistence of differences

---

\* Received: March 10, 2012; Accepted: May 14, 2012.

Te-yu Lin, Assistant Professor of Frenc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and the similarities. The need for differences comes from the fear of the disappearance of difference; similarity originates from the need for mimetic action between individuals. This implicit paradox exists in the rite of gift exchange, which could be considered as a way to pull human relationships closer, as well as a solution to maintain reciprocity. Overall, the refined rule behind the rite of gift exchange meets the need for reciprocity and justice, as well as the need for differentiation in human society. Through Girard's analysis of the rite of gift exchange, we can comprehend the mechanism of the ceremony and its revolution from the origin of culture, as well as its economy and contradictions in modern society.

**Keywords:** Mimetic desire, Double mediation, Inter-subjectivity,  
Rite of gift exchange, Rivalry twins

## 前言\*

嚴格上來說，法國人類學家吉哈爾 (René Girard) 並不是「禮物」專家，他的論述更不直接構築於「禮物學」的範疇之中。如果要規劃一個「禮物學」的脈絡，牟斯 (Marcel Mauss) 的研究以人類學的論述開啟了禮物學的視野，具有劃時代的意義。繼之而來，結構主義時期的李維史托 (Claude Lévi-Strauss)、巴岱儀 (Georges Bataille) 都在牟斯的基礎上，繼續挖掘、考察與延伸。我們如果持續追蹤，近代解構主義或後解構主義以來的德希達 (Jacques Derrida)、布爾迪厄 (Pierre Bourdieu)，皆曾以哲學或消費的觀點，探討禮物的本質，從中進行修正性的批判。不論從禮物的內容或從它被送出與接受的方式來看，禮物可以算是研究人際關係與社會互動的一種有趣的物件。禮物作為人際互動交流的儀式之一，也可以與近來學術界熱門的「日常生活」研究做結合。

吉哈爾向來以「仿效慾望」(désir mimétique) 的論述在學術界自成一格，另外，他的研究具有跨領域、跨學門的特徵，有時也使他不易被理論界或學術界確切地劃分。最初，他以歐洲小說為分析體，從結構上歸納出人物慾望的展演大多具有模仿某一媒介體的特徵。然而，他的研究路徑從文學作品出發，歸結出「仿效慾望」的主軸，再以此發想，進而處理人類學與宗教儀式等議題，開展出一道外於文學初衷的論述。因此，除了文學批評，吉哈爾的理論也可以帶入其他人文學科之中，產生新的意義，不論是人類學、宗教學、神學或戰爭學，尤其是涉及主客體之間互動的領域。正如艾倫·席福特 (Alan Schrift) 所述，「禮物研究之所以不絕如縷的原因在於『禮物學』所探討的正是「主體之間互動的基

---

\* 本文為國科會計畫 (計畫編號 100-2410-H-008-071-) 局部成果之一。筆者感謝兩位匿名審查員精闢的修改意見，也感謝廖珮均同學的文字校訂。

本問題」，當我們談及「禮物」，就會涉及送禮者與受禮者，背後就是人與人的互動，可以是權力架構下的關係，也可以是神與人與神的互動，亦即自我與全然的他者的互動。

本文認為吉哈爾的三角慾望論述，透過主體、客體與介體的三角結構模式，探究「主體間性」(intersubjectivité) 的議題，即主客體之間的拉鋸、纏繞與排斥，實可與禮物交流的文化行為接軌，一來能從禮物的儀式行為審視吉哈爾的理論，其次也能從吉哈爾的角度出發，探看禮物文化下被掩蓋的原始真相。

吉哈爾直接探討禮物的論述不多，也不是以系統化的特徵呈現，甚至有挪用其他「禮物專家」如牟斯、德希達的理論之嫌。不但沿用了牟斯對禮物的三項定義——「給予－接受－回報」，甚至提出來的解決之道都參仿了德希達「延異」的概念 (2001: 32)。另外，吉哈爾對禮物的探討也零星破碎，略嫌淺嘗輒止。然而，事實上，在這些平凡無奇的禮物論述下，本文認為應當注意，吉氏這段論述的文本背景，他將禮物放置在暴力與相互性的範疇之中，視禮物為現代主義獨大以來不斷被曲解、誤識 (méconnaître) 的物件，尤有甚者，在當代社會中，禮物甚至與個人譫妄與集體瘋狂緊密相關，在「交換」的神話下，繼續讓暴力以文明更新的形式續存。

吉哈爾在探討禮物的時候，他卻完全沒有提及上述的自己研發的理論，也未曾運用理論來介入禮物的論述，而只是以隨筆或雜感的方式帶過。本文試圖以作家自己的理論探討自己的禮物論述。一方面從「欲望從他論」的角度著手，分析禮物不僅僅是物質性的存在，而是隨著人際關係的轉移被賦予了形而上的意義。另一方面，我們再以吉哈爾的「敵對互仿」析論禮物的往返需求下形成的衝突與爭端。最後我們反思禮物

往返中的「相互性」，及其與「雙重束縛」的關聯性。要如何用吉哈爾自己的理論來理解人類社會自古以來的禮物儀式？

## 一、吉哈爾的「敵對互仿」：三角慾望、相異性消解、雙重中介

吉哈爾的許多著作，除了專門探討文學的評論集之外<sup>1</sup>，大都談及人際關係與社群組織的相互性問題。直接探討禮物的論著則要出現在 2001 年出版的《地獄來的使者》（*Celui par qui le scandale arrive*，直譯《帶來醜聞的人》）的一章，該章標題為〈相互性與暴力〉，主要探討人際往來中相互性與暴力的問題。<sup>2</sup> 吉氏把禮物的探討放置在相互性與模仿暴力的脈絡之中，然而他對「相互性」（*réciprocité*）的理解與詮釋並不同於傳統人類學家的論述。就吉哈爾來看，禮物之所以是「燙手山芋」，正因為它啟動了「相互性」的運作，而相互性稍一不慎就可以從正向互動轉成負面互動，導致衝突與爭端、怨懟與憤懣的持續升溫，僵持不下，因為「相互性」的原則就是對立、對峙與敵對。

在〈相互性與暴力〉一文中，吉哈爾首先闡述他一直以來強調的「敵對互仿」（*rivalité mimétique*）的概念。<sup>3</sup> 模仿的概念是吉哈爾思想體系中

---

<sup>1</sup> 純文學批評的專書計有 1961 年出版的《浪漫的謊言·小說的真實》、1972 年的《地下室評論集》、1999 年的《莎士比亞：慾望之火》，以及 2008 年出版的《藝術的皈依》。

<sup>2</sup> 必須說明的是，吉哈爾在許多訪談錄中也曾多少提起禮物的議題，然而大多只是片段帶過。2007 年出版的《終結克勞塞維茲》（*Avhever Clausewitz*）再次議論到禮物，但是內容與這本 2001 年出版的專書大同小異，皆是以「相互性」的原則處理禮物背後的人際關係。

<sup>3</sup> 「敵對互仿」的概念是吉哈爾理論體系中最關鍵的一環，這個概念倒不是從原始社會的探勘或人類學的理论而來，而是從文學作品的閱讀而歸納出來。

的關鍵字之一，主導了他的理論之運作與思路。吉哈爾並非唯一提出模仿概念的哲學家，但是他是第一位將柏拉圖以來的模仿論述與暴力結合的思想家。就他看來，人類因為能夠模仿才能擺脫動物性，進入文明。但是模仿更是一種涉及慾望層面的現象。當我們透過模仿某一典範的慾望而產生慾望進而追求的時候，我們事實上正在向這個典範個體（或中介體）掠奪這個物件，我們跟他的敵對性於焉產生。對吉哈爾而言，人類的爭端都逃不開「敵對互仿」的擺弄，許多個體或共同體的關係惡化都是緣於這種相互性的萌竄，但是詭異的是，很少人提到這一個層面的運作，那是因為「敵對互仿」相當懂得掩藏自身，潛藏於人類意識之外，尤其是在當事的雙方，不但看不到相互敵對的醞釀與進行，甚至只能放縱這股敵對情結在雙方之間擴大。

當一個模仿者企圖挪用中介者的慾望物時，中介體自然會抵抗，一旦抵抗了，慾望的強度增強，從原本的單一方向的挪取，慾望變成兩方面的運作。原本是中介體（被模仿者）的一方，反過來爭取慾望，成為他的仿效者的模仿者（Il devient l'imitateur de son imitateur），形成「雙重中介」（double médiation）的現象。雙重中介的情境使原本涇渭分明的主體與客體不再有區別，將兩者變為如影隨形、相互較勁的「偽」主體（或「準」主體），暴力遂扶搖直上，不可扼抑。在這種雙重仿效的關係中，角色不斷互換，兩個個體變成敵對的雙方，像是一種「鏡化效果」（en miroir），變得越得越像，越來越趨向同一化。這道過程就是差異性的消解（indifférentiation），差異的消解又會導向暴力的無限上綱。吉哈爾深信，敵對仿效的概念可以解釋人類關係的衝突與惡化；尤有甚者，由於我們對慾望模仿的問題置若罔聞，使得暴力持續向上攀升，到了一種「無人稱」的境地。沒有一方該為暴力負責，但是暴力的惡果就是真的存在！

吉哈爾以一個簡單的例子來闡述「敵對互仿」在日常生活中的運作。社交活動中，握手寒暄是一件最基本的禮貌性互動，微不足道的事情。你伸手向我，我接著把手遞給你，我們完成了一道最單純的握手儀式。面對你伸出來的手，禮貌上我必須去握你的手。如果不知道是什麼原因，我拒絕加入這道儀式，如果我拒絕模仿你的舉動，你會有什麼反應呢？你會馬上把手伸回去，你會表現出跟我一樣的保留態度，甚至會加倍奉還這種保留的姿態，以便保有自己的優越感。換句話說，當我沒有加入這道握手儀式時，當我拒絕模仿你的時候，反過來是你模仿我，你模仿我的拒絕，複製了我的拒絕。在這個簡單的例子裡，我們可以發現，人際關係的結構是從屬於雙向的模仿 (double imitation) 之中。這種雙向的模仿就是吉哈爾認定的「相互性」。相互性可以是良善的、平靜的，也可以是惡劣的、挑釁的，不論是好是壞，相互性始終都是存在。

因此，人類的衝突並非源自「相互性」的喪失，而是從正向的相互性轉向負面相互性，這道游移的過程相當微妙、不易察覺，但是這個轉變足以使關係持續惡化質變，直至水火不容。吉哈爾所謂的「相互性」永遠脫離不開模仿慾望，相互性從模仿出發，進而使兩道個體趨同，相異性消解，陷入「同一」的暴力之中。在古老社會一如現代社會，相互性是一種難以挪開的絆腳石，它甚至會以無止盡的循環報復型態存在著，像是一場惡性循環，跨越世代，跨越國界，不受時空之拘束。在 2007 年出版的《終結克勞塞維茲》(Avhever Clausewitz) 中，吉哈爾發現這位普魯士名將的戰爭論述中提及的「相互性行動」(action réciproque) 與他自己的理論有相似之處：所謂的「相互性行動」指的就是人與人之間因為互相模仿而變得越來越像，但卻又對於模仿這一事實視而不見。這樣的立場使他們曝露於暴力相向之中，相互性與敵對性最後變成了同義詞



(2007: 113)。

在整個歷史文化的發展史上，現代主義的崛起具有劃時代的意義，現代主義是第一個把自身放置在「相互性」與「同一性」的主義，同時致力於抵抗差異性。現代主義講求平等與良善的相互性，致力於弭平階級制度所帶來的不公平，彷彿所謂的現代性就是要與遠古時代階級嚴密、等第劃分不公平的社會切斷關係。而事實上，我們現在所處的時代是多媒體、數位化的時代，一個偶發的（甚至無厘頭的）行為就能引發傳染性的模仿，全境擴散，支配廣大群眾的行徑，模仿敵對的情節正如火如荼的上演著。尤有甚者，現代社會總是有意無意地鼓動著仿效衝突：透過廣告、新聞媒體，宣揚著一些「模範」，引發群起的模仿，從而陷入相異性瓦解的危機之中。由於「互仿」，人們因差異性消解，於是進入「互防」的懷疑危機，進而暴力相向形成「互妨」，足見在吉哈爾的論述中，相互性能夠催生暴力，使惡劣的相互性以加乘（multiplication）的方式蔓延。

## 二、吉哈爾的「禮物」論述

### 1. 從牟斯的「禮物交換」出發

吉哈爾認為，就像眾多的儀式，禮物也是一種儀式，它試圖強化社會的關係，使所有的事物能夠正常的運作。普遍認為，禮物儀式是資本主義社會操縱下的產物，是為了提昇消費。但是吉哈爾並不是從消費與購買的角度探討禮物，他關注的是禮物交換背後人際互動的真正原因。禮物之所以是一種儀式，在於它的背後有一道縝密細膩的規則支配著它（2001: 37）。從這個角度來看，吉哈爾關於禮物論述的出發點與牟斯在《禮

物》(*Essai sur le don*)中的探討一樣：「理論上，這些禮物都是人們自願送的，實際上這一類送禮、還禮的行為都是義務性的」(11)。吉哈爾也同意牟斯的「全面性報稱體系」(*système de la prestation totale*)，「這種現象表面上看似乎人人自動自發，全不在乎自己的好處，實際上卻是出自身不由己的義務，而且是利己性的」(12)。牟斯認為禮物交換是一種古老形式的契約，他特別分析其中幾個規則：禮物的交換必須符合三個義務：「給予」、「接受」、「回報」(*donner-recevoir-rendre*)，在這些精神機制中最重要的是必須要回禮。如果說收取是義務，因為拒絕禮物「無異於宣戰，是一種斷絕友誼和交往的表示」(23)，同樣的，回報更是一種義務，因為不回禮一方面破壞社會規矩，另一方面會遭人看不起，無法在社會上立足。<sup>4</sup> 如果送禮與收禮是互補的義務，只有在回禮的行為上才真的涉及到交換。牟斯對相互性的理解就在於回禮的義務，在他的《禮物》一書中，相互性與「交流」、「交換」都是密不可分的。

吉哈爾的禮物論述與牟斯相似之處在於禮物交換的必要性，送禮與回禮乃是架構於「全面性報稱體系」，禮物的交換是全面性的，在共同體的人際網絡中，任何屬於這道網絡的一份子都無法逃離這張網。對英國政治哲學家霍布斯 (Thomas Hobbes) 而言，只有威權集中的組織，個人將權力的使用交付給權威，進而鞏固國家，才能使社會達到和平，促成文化與社會的發展。<sup>5</sup> 而牟斯則認為禮物的交換可以取代集權於國家的

<sup>4</sup> 沒有執行回禮的義務，不但會導致仇恨，小則受人歧視，大到遭到驅逐出境，甚至可以引發戰爭。在薩摩亞（西南太平洋的一群島），沒有回禮的人會失去尊嚴，喪失權力 (Mauss 155)；對美國西北邊的印地安人而言，「誇富宴」(*potlach*) 特別是展現權威的時刻，如果沒有回禮會導致社會階級的喪失 (184)。

<sup>5</sup> 霍布斯認為社會是一群服從於一個人的權威之下，而每個個人將自然權力交付給這道權威，讓它來維持內部的和平，並抵抗外來的敵人。這個主權

作法。禮物交換有助於透過義務解決戰爭的威脅，確保和平與相安無事，而不需要動用權力集中的制度。相互性成為穩固和平的條件，有助於共同體的團結，因為相互性建立起彼此的關聯，放棄暴力才變得可能。至少牟斯也透過原始社會秩序的考察來印證相互性的重要性。

然而，牟斯的論述著重在回禮義務的重要性，對吉哈爾而言，這樣的認知顯得一廂情願，因為即使回禮，禮物儀式依然很容易就通向難局。吉哈爾先從牟斯的原則出發，列舉了幾個日常生活中的例子：假如一個禮物比另一個禮物貴重，相差懸殊，吃虧的一方雖然不會表示他的不滿，然而心裡的怨懟其實是很大的。但是，另一方面，佔便宜的一方也沒有多好過，他會認為別人回贈更高貴的禮物是否是一種對他的禮物間接的批評，別人是否在懷疑他小氣吝嗇。如果說，禮物的差異性反應出雙方的不平等，結果只會更糟。佔便宜的一方不但不覺得心滿意足，他反而會心中一股怨怒，感覺對方在羞辱他。吉氏因此可以暫時下結論：

禮物的對等原則必須很謹慎地被遵守，彷彿所謂的禮物其實就是一種「以物易物」(troc) 的行為，只不過必須表現出最高的自發性。人與人之間必須相互模仿，但是同時又必須表現出完全出自不可遏抑的自發性。禮物的雙方必須要能說服對方說，他的餽贈行為是服膺了一道發自內心、無法克制的內在驅力，完全與泛泛之輩的精打細算、斤斤計較無關。(2001: 38)

回禮是一種被迫的仿效行為，在牟斯的理論中，回禮是義務，通向連結與和平；在吉哈爾這邊，回禮表面上能帶來和平，實際上往往是爭端的

---

不論是君主制、貴族制或民主制都必須是一個強而有威信的「列維坦」(Léviathan)，即是一個絕對的威權之下，方能令社會契約實行。

開始，因為回禮涉及了相互性與模仿，而模仿不斷挑起主客體易位、交替的危機，更導致差異性消弭後的敵對衝突。

## 2. 對等與差異的悖論

從上面吉哈爾對禮物的論述，我們可以看出，禮物交換並不如牟斯所認為，是一種和諧的互動應對，社會融合的機制，可以穩定社群關係。對吉氏而言，禮物在執行上需要精巧、敏銳的手腕，如履薄冰的細膩。之所以需要這般的謹慎以待，那是因為這些規則本身充滿矛盾，甚至彼此僵滯不下，對立對峙。禮物的遊戲規則彼此充滿矛盾，幾乎沒有恆定的準則。最大的矛盾之處在於，禮物的收受往返需符應「相互性」與「平等性」的原則，但是同時也必須能滿足「差異性」的需求。

以一個簡單的例子來看，你送我一支高貴的鋼筆，如果我又馬上一本正經地回贈一支一模一樣的鋼筆，品牌、款式，甚至連顏色都如出一轍。在這種情況下，你肯定會覺得被嚴重冒犯。我們再假設，我回贈你同樣的鋼筆，但不是立即回贈，而且選了一支不同顏色的款式。可想而知，我的這份禮物同樣的也是無法被接受的。再進一步假設，除了換了一種顏色，我還刻意換了一種款式或另一種品牌，表面上這樣的回贈行為應該可以行得通了，然而就在差異性變得恰如其分的同時，另一個新的問題又湧現了。你不得不質疑，我回贈的這一支鋼筆會不會是對你原先送我的鋼筆的一種批評或戲謔，你會覺得我是否透過這支回贈的鋼筆嘲笑你之前的禮物。

因此，我們發現，表面上，吉哈爾對禮物的詮釋只是架構在牟斯的傳統論述之中，然而進一步來看，兩人對「相互性」的認知有了歧異：在牟斯那邊，相互性才能確保社會共同體的和諧與秩序，而在吉哈爾這

邊，這一來一往的相互性始終通向無法避開的難局，無法解決，彷彿所謂的「禮尚往來」表面上平行對稱，自動自發，實際操作起來卻是詭異多變，莫衷一是。禮物儀式必須要能突顯相異性，然而「異」得不夠多，又返回「同」的針鋒相對；「異」得太超過，又產生互別苗頭的意味。吉哈爾甚至把禮物儀式的難局比喻做希臘神話中為了躲開卡律布狄斯 (Charybde) 漩渦，結果又落入斯庫拉 (Scylla) 岩礁的險境中，意謂「才脫龍潭又入虎穴」<sup>6</sup>，才脫離一種逆境，又落到另一種好不到哪裡去的境地。用這種神話意象來形容每次到了送禮的季節，現代人總是無法逃脫一種精神焦慮症候群的籠罩。古代的祭司都知道，一個儀式越是有效，萬一它沒有成功時所帶來的後果越是難以估量。在一道儀式中，即便有一個小環節沒有被遵守，原本試圖通向和諧與和平的源頭都有可能蛻變成相互衝突的來源。

### 3. 吉哈爾如何理解「相互性」？

在牟斯的理論中，相互性是原始社會奠基的基礎，李維史托延續了牟斯的觀點，所有的正面的相互性，不論是禮物交換、禮貌性的互動，都被視為社會團結的機制。這種觀點慢慢隨著解構主義之後而開始遭到質疑，吉哈爾對相互性的觀點打破了傳統二元論的說法—交流即是社會和諧的同義詞，這樣單純的因果關係有必要再深化。我們無法證實正面的相互性就是社群和諧的保證，也無法證明負面的相互性就是等於社會組織瓦解。

---

<sup>6</sup> 卡律布狄斯 (Charybde) 是波塞冬和蓋亞的女兒，因為偷竊赫拉克勒斯的牛，被宙斯用雷擊斃，變成西西里和義大利之間的一個大岩洞。從此她每天吞吐海水三次，使那裡形成巨大的漩渦。法語 *tomber de Charybde en Scylla* 意謂「才脫龍潭又入虎穴；才脫狼窩又入虎口」。

在吉哈爾的理論中，「相互性」無可避免地永遠會通向暴力。吉氏幾乎否定了「相互性」作為維持社會秩序的可能，因為它會不斷透過擲出與回返的運作，使暴力不斷累加，往極端攀升。在吉哈爾的思想體系中，「相互性」之所以能帶來不可遏止的暴力，那是因為它與「仿效」(mimésis) 放置在同一道平面，而「仿效」注定會因相異性消解而導致對立對峙，因此與牟斯相反，吉氏認為相互性不但不是團結保證，它甚至能導向社會次序的解體。

如果慾望的本質是仿效性的，所有慾望引發的現象都會朝向相互性而進行。所有的敵對都是一種關於物品的相互性特徵，不論導向敵對的原因為何；如果大家彼此成為對方的楷模兼絆腳石 (modèle-obstacle)，相互性也會在慾望的範疇裡進行。(1976: 11)

人類實為模仿慾望 (désir mimétique) 所操弄與駕馭，不自覺地（即便察覺，要擺脫這種束縛也屬徒勞）。這種「你要我就要」的擬仿相爭可以導致暴力的無限坐大。吉拉爾在他的第一本書《浪漫的謊言·小說的真實》(*Mensonge romantique et vérité romanesque*) 中，藉由對塞萬提斯、斯湯達爾、福婁貝、杜斯妥也夫斯基與普魯斯特的閱讀，歸納出仿效慾望的共通特性，隨後更進一步將此線索加以理論化。人總是需要模仿典範，而為了要使自己儘可能與他們相像，會企圖竊取慾望對象最重要的物件。由於這一物件是不可共享的，典範者與仿效者之間彼此變成對方致命的障礙：這便是貫穿吉哈爾著述的「敵對互仿」，這種敵對現象可以擴展至團體、社群等共同體之間，導致關係惡化，放任暴力扶搖直上，以火燒燎原之姿。

大家彼此模仿，同時又聲稱自己慾望的原創性與先前性。這些關係具有對稱的特徵；這兩個個體會覺得彼此之間非常不同，然而事實上，他們如出一轍，責備其中一個的時候同時也牽涉到另一個。(1978: 119)

模仿指的就是兩位敵對個體逐漸相像的過程，這道過程與暴力的升溫是成正比的，這兩道過程彼此刺激、催化，整個局面導向無止盡的敵對衝突，暴力的無限上綱。吉哈爾所謂的解體的力量就在於不斷經仿效而繁衍（或分化）出來的主體。正如毛榮富申論，「這種模仿是會反饋的，使模仿的兩造成為對方的鏡中像，以致於變成一種模仿的譫妄狀態。但在社會制度中已不允許再以犧牲品來化解危機。於是整個社會陷入一種雙重拘束狀態：模仿而且不可模仿。模仿，因為人類關係是模仿的；同時又懼怕模仿，因為懼怕模仿會如脫韁野馬，造成社會的失序」(99)。

從這個角度來看，社會秩序是必須建立在「相異性」之上，使每個人的建制能夠強化。所有的禁制，不論是性別上或血緣上的禁忌，都試圖要避免「同一」與「暴力」。有亂倫的禁忌才有父與子的區別，原始社會對雙胞胎的禁忌與避諱同樣是為了避開分裂成兩個雷同的主體。仿效的行徑一方面使對峙的雙方邁向「趨同」，導致相互性的暴力，最終引發相異性的消解，和社會秩序的瓦解。因此，「相互性」的元素要能夠透過相異性的秩序隱匿起來，倘若沒有隱藏起來，「相互性」會引發暴力相向與社會功能的解體。

相互性會以快捷的方式讓自己變得越來越明顯，隨著相互性的外顯，善意的交換不再存在，而是演變成惡意的交換——咒罵、



打架、報復和神經症狀的相互性。因此傳統文化拒絕這種太直接的相互性。(吉拉爾 43)

人際關係是建立在相互性的原則：其中一人無意地擲出了一道負面的信號，另外一人也會回以另一道負面記號，加倍奉還，導向暴力的惡性循環。社會組織的基底正是在於遏止這種無止盡的暴力，禮物這種儀式如果執行成功，可以帶來正面的相互性。相對的，若是無法奏效，禮物也能開啟衝突，放任暴力向上攀升。

因此，吉哈爾的理論中，禮物不但不是強調相互性，而是以隱藏相互性為最高原則。必須以相異性的秩序來化解「同一」的危機。禮物從一開始就具備矛盾性：一來，它的源頭建立在對「同一」的恐慌，對鄰近之物的撤除，而所謂的鄰近之物往往就是禁忌之物。；其次，透過將自己無法受用或禁止享用的物件擲出，從他人那邊獲取良善之物，而這個東西之所以能被接受只是因為它來自與自己相「異」的範圍。吉哈爾斷定這就是交換的緣起。

禮物的來源是交換，而交換的需求則在於化解某種同一、無差異狀態所隱含的危機。吉哈爾經常談到，禮物是一種有毒的東西。「禮物」這個詞本身就具備兩義性，在德文中，Gift 這個英文「禮物」拼字的意思是「毒藥」。禮物召喚起兩個實力相當、勢均力敵的個體。從人類起源的角度來看，禮物其實是人類試圖以交換的方式擺脫的物件，和鄰居交換他們也試圖擺脫的物件。共同生活在一起的準則就是在於：交換而又不顯露出相互性。交換要能夠達要有效性，就必須要驅除相互性的回返。對吉哈爾而言，禮物的難局在於「相互性」的難以規避。如何擺脫比較的心情？如何使送禮與回禮相得益彰，不落人口舌，不引發比較、競爭



與對峙的情結？不引發詮釋與誤會？禮物隱藏起來的結構，就是對立性、相互性與敵對性。在一個相互競爭的世界裡，幾乎不存在什麼穩固、折衷的關係，人與人之間永遠有主控者與被操控者，但是這樣的關係並不是固置、恆定不變的；人與人的關係像一座翹翹板，當其中一人位居高處時，另外一人只會是最低處，不斷地輪流。

在仿效暴力的世界中，只有反應動作，沒有行動。禮物永遠是因應某種先前的動作而生，因此禮物只會是一種反應 (*réaction*)，而不是單純的行為 (*action*)。

這是一種沒有開始也沒有結束的過程，它只會是循環性的：它完全圍囿在自己的循環裡面，難以捕捉，難以駕馭，我們不曉得要從哪一個角度捕捉它。禮物從一開始就已經是一種形而上的物件，所有將它物質化的企圖都只會失敗，它的現身同時就已經涉及對超驗（神性、自主性）的追求。禮物將人類導向兩道個體的爭端，像一種無法平衡的天秤。

### 三、解套之道：從毒藥到禮物

他人送我的禮物永遠不可能等同於我送他的禮物，價值總是低一點或高一點，隨情況有所不同。但是無論如何，只要不要太快回禮，這中間的價差是沒有人會注意到的。相反的，要是回禮的速度太過靠近，這個回禮有可能會引起誤會或誤解，進而引發仇恨。其中一方會以過激的方式回贈他所感受到的敵意，於是正面的相互性轉變成負面的相互性，原本的相安無事轉變成爭鬥不休。

吉哈爾認為，在古老的社會中，一些表面上的差異化的確使共同體免於惡性相互性的困擾。他根據一些農村社會或村落的習俗，發現許多

日常交易行為都有避免快速的傾向。如果有人在市集裡面買了一頭牛，賣方會先邀請他到附近喝一杯酒，彷彿是要延緩「算帳」的時刻。「算帳」同時也是雙關語，可以是純粹的買賣交易行為，也可以指向敵對鬥爭，似乎也點出人們對相互性的恐懼 (2001: 32)。

因此，吉哈爾對相互性提出的解決之道就是「延異」(différance)，他挪用了德希達的理論，延異可以是空間上的間隔，也可以是時間上的延緩，不即刻性的接軌與回應。

差異與延異可以摧毀或掩藏過於顯著的相對性，儘可能將時間的距離拉長，從而使相互性不易被察覺，儘可能的將「同一」、「相同」的情況散播在差異的脈絡中，致使人們無法再尋獲相互性 (2001: 33)。

「延異」是德希達解構論述中相當重要的概念，同時具有時間延遲與空間差異的雙重意義。「時間」也是德希達區分「禮物」與「交換」的標準，對他而言，禮物必須超脫交換循環，而時間正是禮物之所以能超脫交換循環的條件，必須讓償還一直「延異」下去，也就是禮物「給予時間」。然而，吉氏雖從德希達理論借取了「延異」的觀念，賦予禮物的意義與效果卻不同：在德希達那邊，「延異」在於將禮物脫離由交換的經濟所形成的循環體系，只有當禮物是「絕對禮物」的時候，禮物才是真正的禮物，德希達並不主張人類的起源論，因為所謂的起源，都是一個「總是已經」(toujours déjà)；相反的，吉哈爾的「延異」論依然有一個超驗的源頭做基礎，人類的起源曾有一個具有「超驗意義的能指」，只不過後來不斷地被遮掩、藏匿，正如禮物的源頭是一種交換的企圖，但同時這種企圖必須以抹拭相互性為目的，才能調節暴力。禮物是為了避免「相

互性」的過度直接，但是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它卻必須不斷挑起「相互性」。

吉哈爾閱讀了馬林諾夫斯基 (Bronisław Malinowski) 的《南海舡人》(*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特別提出西太平洋島上居民的一種交換禮物形式，對他而言是正面相互性的例子：太平洋島國的居民透過禮物交換來強化共同體的友好關係，但是他們交換的不是短暫、可消費型的禮物，而是一些神聖的物件，送來送去都是一樣的東西。居民會以崇高的精神把這些聖物帶到鄰人的船上，受禮者不會馬上就去取出，而是等過了一些時日後，才將這些聖物帶往鄰近的島嶼，同樣以崇高的精神進行儀式。透過禮物不斷地輾轉交流，每個人都送出與收到同樣的禮物，但同時卻又蘊含著無窮的神秘性與未知性，因為這些禮物都是神聖的物件。和我們現代社會的禮物交換體系不同，這種型態的交換不需要龐大的金錢，不需人力支出，也不耗費時間。這種禮物也不會招來惡意的比較，可以說有現代禮物之優勢，而無其缺點。

從上面這個例子我們可以看到，禮物可以是一種合作，但必須是與時間合作，不參與暴力的合作。禮物其實體現了現代社會人際關係的難局。透過禮物，現代人進行交換的儀式，有效地交織出人際網絡，強化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維持社群的良好互動，使週遭的事物能正常的運作。但是禮物的有效性與它的矛盾卻也只是一線之隔。禮物所指涉的相互性很容易就導向無差異狀態，導致失序。尤其在當代社會中，相互性的往返速度隨著科技的進步變得更加迅速。禮物文化既有效地拉近人的關係，但同時也使他們陷在焦慮、懷疑與敵對的困境之中。

洞悉擬仿慾望的運作才能了解暴力的機制，以及人際關係網絡上的互動難局。「仿效慾望」的理論也抨擊一般的道德論述的無能與侷限，以

及意識形態上的霸權。道德家總是勸人避開暴力，但是對他們而言，在某些情況下暴力也是被允許的，如果事涉正義的捍衛。然而這些道德家並不探討，這種秉持正義而進行的捍衛行為其正當性又如何。一般的泛道德式的定見並沒有改變暴力的體系，相反的，它延續了人們對暴力的迷思，認為暴力都是來自他者，而未曾思索，我們自己本身也正在參與暴力之中，與暴力合作而不自知。

### 結語

吉哈爾的理論提供我們另一種對禮物的看法，尤其是禮物與相互性之間欲解還結的關係。「敵對互仿」的理論可以幫助我們超越加諸在禮物身上的定見或約定俗成的泛道德觀點，使我們重新思索相互性與禮物之間弔詭的連鎖關係。吉氏引領我們從起源的角度觀看禮物儀式的有效性，同時也看到，當儀式未能奏效，也可以引發一連串的連鎖暴力，陷入惡性循環之中。從禮物的交流，我們也可以看見相互性如何在現代社會中持續它弔詭的顯現。真正的禮物不在於思索物品的價值或特質，而是放棄物件。物品的價值永遠與它所掀起的仿效性敵對的後果不成正比。放棄物品，意味著放棄參與暴力的運作，必須在一開始就拒絕加入物品的爭奪角逐，才能使禮物的儀式能發揮效用。

## 引用書目

### 外文書目

- Dumouchel, Paul. Dupuy, Jean-Pierre. *L'enfer des choses. René Girard et la logique de l'économie*. Paris: Seuil, 1979.
- Girard, René. *Mensonge romantique et vérité romanesque*. Paris: Grasset, 1961.
- . *Critique dans un souterrain*. Paris: Grasset, 1976.
- . *Des choses cachées depuis la fondation du monde*. Paris: Grasset, 1978
- . *Celui par qui le scandale arrive*. Paris: Hachette, 2001
- . *Avhever Clausewitz*. Paris: Carnets nord, 2007
- Lacourse, Josée, “Réciprocité positive et réciprocité négative: de Marcel Mauss à René Girard”, *Cahiers internationaux de sociologie*, n. 83 (1987 juil./déc.) : 291-305
- Malinowski, Bronislaw. *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 New York: Dutton, 1961.

### 中文書目

- 毛榮富。〈慾望之邏輯：吉哈爾論模仿性敵對與文化起源〉。《思與言》，第32期，（1994年）：85-110。
- 吉拉爾。《替罪羊》。馮壽農譯。台北：臉譜出版社，2004。
- 牟斯。《禮物：舊社會中交換的形式與功能》。汪宜貞、何翠萍譯。台北：遠流，1989。

